新的探索 新的思考

——《图书馆学通讯》第二次召开关于“转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问题研讨会

《图书馆学通讯》自1985年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讨论，至今已近两年。这一讨论能否取得新的进展，引人注目。1987年6月在召开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研讨会的同时，本刊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专门召开了“再谈转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问题研讨会，会上，一批长期思考理论宏观问题的中青年对这一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新的思考。

鉴于在过去的讨论中，原来图书馆学中的内向思维的研究方向已受到有力的抨击，理论界大多数人已接受了图书馆学理论必须面社会，改变了从原有的工作内容过程出发，逻辑经验地研究方向；同时面向应用，为图书情报事业的现代化服务的观念。这次讨论中，代表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寻找新的思路，探索转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突破口。

关于研究方向的讨论是在对新时期十年图书馆学的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的。代表们认为，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经历了超越性变革，这场变革的最大功绩，在于突破了原有图书馆学的经验框架。这种突破需要理性的思辨，但由于突破之后未能及时调整，理论界似乎又步入另一个极端，纯思辨的经院研究之风有所上升。这种情形引人深思：为什么图书馆学研究总是在经验描述和空泛思辨两极徘徊？为什么图书馆的理论与实践有如此坚深的隔阂？大家开始认识到原来图书馆学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理论的结果得不到实践的检验，实践中许多课题也无法借助理论的力量解决。

1986年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兴起导致对纯思辨的理念主义思潮的批判。尽管发展战略研究当前遇到许多实质性困难，研究难于从战略思想转向战略措施，但它给人以新的启示，发展战略研究有理论深度，不限于图书馆内部，绝非对图书馆具体活动的直观描述；发展战略研究又有很强的现实性，须直接解决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并非纯思辨。大家认为，发展战略研究中所表现的这种类型的研究，有可能形成图书馆学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的结合点。

这个结合点的名称，有人根据自然科学将科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研究、开发研究（或发展研究）、应用研究的“三分法”。“开发研究”也有人称之为第三种图书馆学，大家没有就称谓多所讨论，有待通过进一步研究明确这种理论形态的界定、特定及与它种形态的相互关系。

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转变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就是从单一的纯基础研究或纯应用研究转向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并重，使三者有明确的分工并具备完善的相互转化机制。在当前，就是要大大加强开发研究，把近年来图书馆学研究的新成果及时转化为图书馆事业主管部门的决策咨询或改革图书馆工作先进流程的论证依据。

代表们充分意识到这一转变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开发研究要求从以往的孤军作战变成集体研究，单一学科研究者的协作变成跨学科研究者合作，自选自定课题变成承接委托课题，义务的研究变成有偿的或职业的研究。因而在理论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重议论、轻调查，重思辨、轻论证的研究方法必将成为从事开

试析“三个如何”之如何

袁 丁

最近，《当代中国》丛书图书馆事业卷编委会为其撰稿人组织召开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以便对三十七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些重大事件、会议和重要人物及经验教训等有一个总体把握。我有机会在会上听到不少颇有“见道之言”，对有的问题感到很有兴味，也勾起脑海中积贮已久的许多思考，又有一种愿望想将会上碰撞着的一个尚不成熟的思考赶快写出来，作为一种意见与同行交流。不很谦虚地说，我对本专业并不十分陌生，三十多年的业务实践和编辑实践，尽管鲜有成就，但由于长期在编审的岗位上，职业迫使我不得不经常冥思苦想一些专业理论问题上的难点，翻阅了一些有关的重要书籍，对问题的“症结”所在略有所悟，凭着这点，不妨效“野人献曝”，与同行对个话，也许不为无益。

讨论提纲一连提出九个如何，如：“如何评价建国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成就及建国前的基础？”“如何看待历次政治运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如何看待文革后期（1971）的业务恢复和<中图法>、<汉语主题词表>的编制？”等等。看来是由于撰稿需要对解放后这段图书馆事业发展史进行评价而提出的，其实它们是图书界早已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在此丛书未编写前，不少有志于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图书馆学者曾就其中许多方面不断咂摸着试图解释，但毕竟是讨论多，论证少。通过这次较高层次，特别是亲历目睹者的回顾、讨论、对话，这些问题是否就将迎刃而解，我并不以为然，但使我求解之心更切，并愿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这是我思考的主线。

上述三个“如何”的核心是如何看待政治因素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对于前两个“如何”，一般来说，图书馆是一种社会部门，图书馆的发展不仅与社会思想、社会制度有密切关系，而且与支持图书馆的文化结构和价值观念有密切关系。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疑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例如中国古代藏书楼与近代中国图书馆固不可同日而语；而与解放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更有天壤之别。任何社会制度的变革必然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变革。但文化却总是不可割裂的，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解放后的图书馆事业，也要从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着眼来分析，把握我们事业发展的许多现象，如衡量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诸要素之一——馆藏，就其总体来讲，终究是几千年来古今中外科学文化发展成果的继续，各种著作虽有其阶级局限性，而在根本上依然有其社会性。忽

发研究的一股强大的阻力；以往的科学组织方式和现有决策程序对开发研究也存在课题的制定与下达、研究人员的培养与组织、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应用等各个环节不利于开发研究的兴起。

面对困难，大家充分意识到自己当前的建设使命。他们一方面决心“从我做起”，为逐步转向开发研究从事理论和方法上准备；另一方面，他们也呼吁图书馆界有关各级管理决策部门、各有关学会协会、各刊物编辑部大力支持开发研究，依靠整个图书馆界的努力，实现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真正转变，求得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相适应的发展。（并思）